日元上所印的人物，是近世以来该国最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医学家，譬如福泽谕吉、夏目漱石、通口一叶、野口英世等。新渡户稻造，便是1984年版五千日元上的那位了。

新渡户稻造，政治家、教育家、农学家，创立东京女子大学，担任过多所大学校长，为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妇女之教育做出极大的贡献。他也被视为在欧美和日本之间的一个文化桥梁，以其著作和政治活动促进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相互了解。

新渡户于1862年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13岁的时候进入东京英语学校。后来到北海道农学校学习农学，在那里受到学校创立者克拉克博士的影响而成为基督徒。深厚的日本文化底蕴和先进的西方文化于他的思想中交织，在他报考东京帝国大学之时，就立志要成为“太平洋之桥”，“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

新渡户成长的时代，正是明治维新时期，彼时之日本正全盘西化，有食洋不化者主张与白种人通婚以改造日本人种，废除日语以便与欧洲列强接轨。但学贯东西的新渡户认为：只有掌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人。

一战之后，新渡户在国联事务局担任次长，在七年的任期里深受各国政治家好评。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际活动家，在日本退出国联，二战即将爆发的危机中，新渡户依然为促进和平而奔走，将军阀视为等同于共党的足以灭亡日本的祸害，从而引起军部和右翼分子的敌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广受攻击，甚至连他的众多朋友和学生也与之反目，这期间，新渡户为其和平主张几次遭遇生命危险。1933年，新渡户稻造在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归途中病倒，病逝于温哥华，终年71岁。

新渡户最为西方人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1900年出版于美国的英文著作《武士道》，这本书系统性地谈到武士道的产生渊源、发展和未来的命运，向西方人深入地介绍武士的名誉、礼仪、经济等各方面的观念，将武士道和基督教进行比较，凸显它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相似之处，也指出作为人为的法则之武士道与天启的信仰的根本差别。

武士道确立了日本的道德观念。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日本人“所遵循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就是武士道”（威廉·格里菲斯为《武士道》作的序）。为此，新渡户以《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为全书的开篇。

新渡户“相信基督所教导的，并由《新约圣经》所传留的宗教以及铭刻于心的律法”，他（就如其他一些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中的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一样）同时也认为，“上帝在一切民族和国民中——不论是异邦人或犹太人，基督徒或异教徒——都结成了被称为‘旧约’的圣经。”新渡户认为，武士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类乎于《旧约》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他引述明治时期的维新派武士西乡隆盛所言：“道是天地自然的东西，人是行斯道的，目的在于敬天。因为天对人对我都毫无区别地施加仁爱，所以应以爱我之心爱人”以说明“在道德实践方面，自然宗教能够与启示宗教接近到何等深的程度。”他高度评价武士道：“胜过武士道的、有资格加入宗教行列的伦理体系就很少了。”

新渡户以西方的骑士道和日本武士道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似点：即都受到宗教精神的灌注，从而具备某种道德规范。正如基督教向骑士道“注入了灵魂的素材”使“宗教、战争、光荣”成为“基督徒武士的三个灵魂”，武士道也具有宗教性的渊源：佛教赋予武士道以平静的听凭命运的意识，使武士能恬静坦然地面对生死，神道则赋予武士道对君主的忠诚、对先祖的尊敬和对父母的孝行，孔子的教诲则构成武士道的道德基础。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在教义的层面上对神道和基督教进行对比：神道没有基督教“原罪”的观念，相反，它认为人心本善，如神一般纯洁，“当心完全平静而且澄澈的时候，就反映出神的崇高形象”，因此，神道教与基督教不同，它对教徒几乎不规定任何类似信经或要理问答这样的信仰条款，而是提供直截了当的行为准则。这一点，自然地，也体现在武士道中，这也是武士道崇尚知行合一的根本原因。

新渡户以武士道的训诫和武士的诸多故事来凸显武士道精神和基督教教诲的相似之处，武士道的基本准则在于：“忠”“勇”“义”“礼”“仁”“诚”，再加上“名誉”和“克己”。正是这八个准则塑造了武士乃至大和民族的精神气质。新渡户对这些准则予以高度评价，譬如，提到“义”，新渡户说，这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这一教诲让武士最厌忌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武士道的义，是一种支配人的行为之权威，教人凭理性正确地行动，防止人逃避义务，就动机来说，“远远不及基督教的爱的教导”。新渡户认为，武士道的义产生于人为的社会条件即阶级差别，因此，出于这种人为性，武士道的“义”的观念，“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太狭隘了”，和基督教的“义”的观念相比，不过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地看到基督所说的义的影子。

说到“仁”，武士道告诫人“不要沉溺于不加区别的溺爱之中，应该加上正义和道义”“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适当地考虑了正义的仁爱……是在其背后拥有生杀予夺的仁爱……包含着加给对手以利益或损害的实行力量”。就此看来，武士道的仁爱观念与奥古斯丁、阿奎那所阐释的基督教的正义战争观和人道观念是不谋而合的。于“战斗恐怖的高潮中，唤起哀怜的感情”，在欧洲是由基督教完成这一教化，而在日本，则是由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来为充满尚武精神的武士道注入温柔、怜悯。作者认为，武士道倡导的“仁”，是基督教推行的红十字运动在日本国民中间很容易站稳脚跟的缘故。

但是，武士道精神所塑造的崇高道德水准，恰恰正是日本国民难以接受福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人满足于自己的义时，又如何接受从基督而来的义呢？武士道所塑造的品格，对武士接受、保持基督信仰，是一把双刃剑：在序言中，格里菲斯提到一个在美国的少年武士，临死之时拒绝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纵使我理解了你们的主耶稣，我也不能只把生命的渣滓献给他。”在《忠义》这一章中，作者提到，一个牧师始终无法用忠告挽回一个放弃信仰的基督徒，但用此人曾一度向主宣誓过的忠诚——即武士道的忠的观念——来打动他，这个人马上幡然复归于信仰。

新渡户也指出武士道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别，譬如武士道推崇信实，因此武士把发誓认为是对自己名誉的毁损，这与基督教的“不可起誓”相似而不同；又譬如武士道和基督教，都倡导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服务于高出自己的目的”，但武士道的逐级奉献是这样的：女人为男人舍己，男人为主君舍己，主君也由此而顺从天命。新渡户当然知道这个教诲的缺点，为此他比较道：要求人“各自直接向造物主负责”是基督教的优点。

在本书所提及的一个近似《赵氏孤儿》的日本故事中，一个家臣为保住领主的血脉，而用自己的孩子替代幼主，并且这个孩子是自觉且心甘情愿地去为幼主牺牲。尽管新渡户以亚伯拉罕献子为祭与之类比，以期说明二者的相似之处，即对某种义务的呼召的顺从，但是明显地可以看到：作为人的理性的产物，武士道伦理所产生的“奉献”“取义”的故事中的主角，更类乎于克尔凯廓尔所说的“悲剧英雄”，而非亚伯拉罕这样的“信仰义士”。

武士道精神的宗教性基础没有“罪感”但有“耻感”，然而，“人类所有的裁缝技术，在缝制一条足以有效地遮蔽我们的羞耻感的围裙上一直还未取得成功”，武士对耻辱的恐惧每每带着病态的性质，因此，一些性情急躁的武士往往由于琐细乃至想象的侮辱，就立即发狂，诉诸武力，断送许多人的性命。但新渡户也指出，用不正常的例子来责难武士道，就如用宗教狂热和伪善的例子来判断基督真正的教导一样，是不公平的。

武士道本身既然来自于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的军事战斗集团，本身必然也具有严重的缺点，新渡户认为：尽管“武士道并不要求我们的良心成为主君的奴隶”，但难免堕落，被人利用，譬如其“义”，很容易成为“怯懦者的安乐窝”，为罪行辩护和解释；武士道也要对日本国民的缺点和短处负责，日本人遇事易激动，妄自尊大，日本在哲学领域缺乏贡献，都与武士道及其教育制度紧密相关。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对武士道的利用和歪曲，足见新渡户先知般的敏锐和深刻。

武士道精神也必然影响日本基督徒的信仰情感。武士道推崇自我克制，有所谓“最好的武士三年一笑”的说法，感情不外露，就成为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日本的基督教会“信仰热复兴并不频繁”。日本基督徒认为轻率地谈论心灵的体验无异于破坏十诫中的第三诫——“费许多唇舌来表达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宗教上的东西，在我国国民中看来，这是它们既不深邃，也不真诚的明确标志。”或许，这也是日本自文明开化以来，基督教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

在这本书的结尾，新渡户指出，英美式的基督教“比起耶稣基督的恩宠和纯粹”“毋宁说包含了许多盎格鲁萨克逊的恣意妄想”。如果这样的基督教传到日本，无异于是在“武士道这个树干上”嫁接的“一根幼弱的树芽。”这就是说，这样的基督教无法在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扎根结果。新渡户尖锐地指出：“新信仰的宣传者们应当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而在荒地上去播种福音的种子吗？……这样的办法在日本却是完全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耶稣本人在建立其地上王国时所绝不会采用的办法。”

基督教的率先信奉者在传播这一信仰时，难免将本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私货？）裹挟在其中而加添给后来的接受者，这是近代许多西方基督徒在福传工作中的通病。正如雪莱的《基督教会史》中所指出的：“早期传教士一直没有意识到福音在其他文化中引起的冲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基督教的西方模式就是基督教。因此，使一个印第安人或马来西亚人成为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他变成一个荷兰人或葡萄牙人。”新渡户认为，基督教在日本传教的失败，就是西方传教士们将基督教与日本的思想习惯割裂。

一个多世纪前这位日本基督徒思想家所主张的，正是基督教的日本化——唯独如此，基督教才能“解开捆绑的绳索，脱去外国的制服”，“解脱它的外国的形式和装潢，不再是一种舶来品，而在武士道发展起来的那块土壤中，深深扎下根子。”

认识本民族文化需要福音所成全的内容，发现本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粹之处，促成福音和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使二者相互服务、相互造就，这是现代各个不以基督教为传统主流宗教的民族中的基督徒在完成基督教处境化的过程中必需的思考和践行。在这个意义上，《武士道》一书所提及的若干思想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化一定有所启示。

推荐指数：★★★★

阅读难度：★★

适宜读者：神职人员，历史爱好者，日本文化爱好者

推荐理由：深入而客观地介绍日本武士道，融贯东西文化，促进当代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化思考。

作者其他作品推荐：《修养》

https://mp.weixin.qq.com/s/1wCkGoG6Otgr1hCdXzU2TQ